



# 自足性与异质性： “文学新浙派”的现实与可能

□周保欣

自6月以来,本报重点关注“新南方写作”“新东北文学”“新北京作家”,并开设“从地域出发——”笔谈专栏,多角度地就相关问题展开深入讨论。《江南》杂志2023年第5期推出了“文学新浙派”,如其“主编邀约”所说:“‘文学新浙派’的登场与发展,一定离不开评论家、作家和各方力量的支援。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开篇时如此描写马孔多这个地方:‘这块土地还是新开辟的,许多东西都叫不出名字,不得不用手指指点点。我们期待人们伸出助推之手,对着这个文学新物’指指点点’”。本期特邀评论家张燕玲、周保欣,分别从“文学新浙派”的文本细读以及浙江文学的历史文化渊源两个角度,对“文学新浙派”的作品和局限进行分析解读,也期待更多像这样具有新意与生命力的“文学新物”的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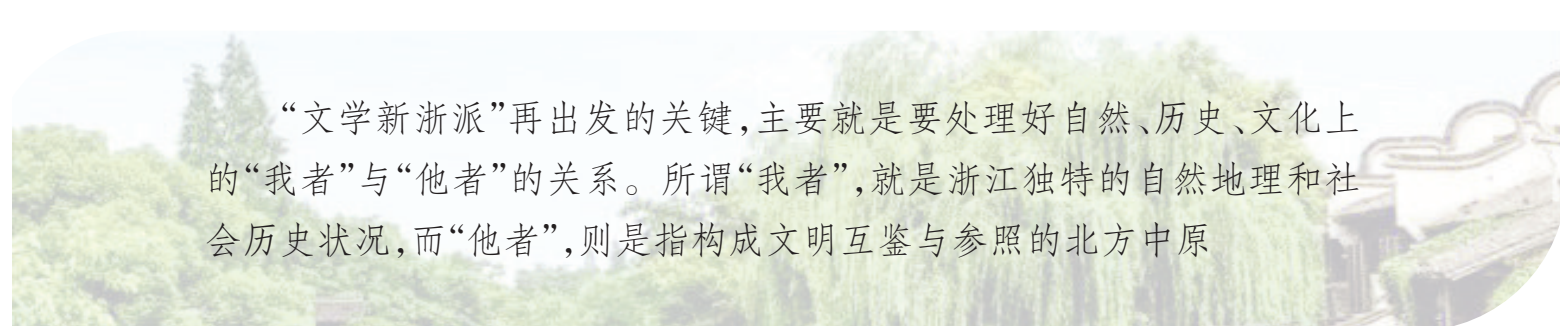
——主持人 行超



提出“文学新浙派”这个概念并不是标新立异,更非认为浙江的文学就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或自成一种整体的风格。所谓“派”,《说文》的解释,是“别水也”。“文学新浙派”这个概念,其实正如流域的水系,百川归海,本异而未同,既有“一”的整体性,更有“多”的丰富性,是“一”和“多”的统一。而所谓“新”,显然是从历史坐标中提出的。浙江文脉幽深,明清以降,诗、词、散文、戏曲等,皆有统领性的人物。特别是近代以来,王国维、鲁迅、钱玄同、茅盾、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穆旦等,更是大放异彩。和现代文学相比,浙江当代文学影响力明显减弱,既没有出现鲁迅、茅盾那种大师级人物,也没有多少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

浙江当代文学的薄弱,是否意味着浙江当代作家禀赋、才情、创造力就不如现代作家?其实未必。放在全国格局来看,时下的浙江文学并不算弱,单就小说而言,就有李杭育、余华、麦家、王旭烽、艾伟、吴玄、钟求是、哲贵、王手、海飞、东君、界愚、斯继东、雷默、张忌、萧耳、草白等大批实力派作家,海外则有张翎和陈河等,阵容相当强大。如今我们提“文学新浙派”,首先就是“新浙派”的自足性问题。从行政地理上把浙江作家归为“新浙派”显然是不科学的,而从自然地理上,浙江其实也并不像北方平原地区、四川盆地、关中平原等地那样,具有自足的地理单元的特定性和同一性。浙江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内部地形复杂,众多水系、水系把浙江分割成诸多大小不一的地理单元,浙江方言区域分布之丰富,亦与此有关。另外,钱塘江把浙江分为浙东和浙西,两地地理、人文、风俗相去甚远,河姆渡和良渚,更是不同的文明体系。

但综合历史、地理等多种因素来看,浙江文学确实有它的自足性。首先,浙江的历史与中原为主导的“国家史”不同。虞、夏、商、周构成的国家史起源,它的主要地理位置在黄河中下游一带。这种国家史的起源在中原有清晰的地理定位和时间记忆,但在浙江,其历史却是从吴、越争霸开始的。《越绝书》云:“昔者,越之先君无余,乃禹之世,别封于越,以守禹家。”浙江的历史不像中原陕西、河南、山西、山东、河北等地那样,具有时间的贯通性。历史的异质性,决定着浙江作家很难形成北方作家那种家国天下的历史宏通感,很难形成那种宏大、开阔的历史叙事。浙江当代小说家中,王旭烽应当是为



“文学新浙派”再出发的关键,主要就是要处理好自然、历史、文化上的“我者”与“他者”的关系。所谓“我者”,就是浙江独特的自然地理和社会历史状况,而“他者”,则是指构成文明互鉴与参照的北方中原

数不多的具有历史感的作家,《茶人三部曲》《望江南》等,都有那种在国家的大历史中书写江南历史和文化的尝试。《茶人三部曲》写杭州忘忧茶庄主人杭九斋家族四代人的命运,从晚清往下写;《望江南》则以新中国成立前后的20年为期,另写杭氏家族茶叶世家的命运。王旭烽的历史热情,很大程度上似乎是与她的杭州大学历史系毕业生的身份有关。除王旭烽外,李杭育、余华、麦家、艾伟、钟求是等,这些擅写长篇小说的作家,则很少有以历史为背景的小说问世。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等,麦家的《人生海海》、艾伟的《爱人同志》《风和日丽》《镜中》、钟求是的《等待呼吸》、张忌的《南货店》等,虽然从中可见历史的影子,但大多数都是作家从个人的生活史、生命史出发,将个人的命运植入大历史中。浙江作家直接写历史题材小说的,更是寥寥无几,即便是写历史,也是像蒋胜男的《半月传》《燕云台》《天圣令》《铁血胭脂》那样,重在写辽、西夏这些边缘地理、边缘王朝人物的历史。

浙江当代作家的异质性,除了历史的因素外,还应该地理的因素。从大的地理形貌上看,浙江地处东南,植被丰饶。外部向海,内部山系与水系分割,决定着浙江作家在地理的空间感受和想象上,很难形成北方大平原地区作家的“南—北”“东—西”的地理贯通意识。浙江作家创作小说,一方面,其语言、文字、人物、故事、叙事等,应对着自然世界的丰饶,必然会形成和江南自然地理的呼应及感通。就像艾伟的《南方》中所描述的,“这是一个炎热的地方”“这是一个水草生长得格外旺盛的地方”“这是一个各种气味混杂的地方”。“南方”以其独特的自然和“人—地”关系,打开人类生命的丰富性。另一方面,浙江作家的地理想象,往往会受制于其东南一隅之逼

仄,而缺少地理关系的通达。艾伟的“永城”、钟求是的“昆城”、哲贵的“信河街”等,都是限于某一个特定的角落。一旦打开地理想象,这些角落便通向外部广袤的世界。艾伟《镜中》所写到的地方,除杭州外,就是缅甸、日本和美国。钟求是《等待呼吸》,除杭州、温州、北京外,就是莫斯科。哲贵的小说,大多发生在一个叫“信河街”的地方,而“信河街”所联通的地理关系,基本上就是意大利、西班牙、美国等,或者就是富有诗意化的香格里拉、青海湖等。杨怡芬的《离殇》《海上繁花》等,除写到舟山外,基本的地理联想就是上海。浙江作家的小说地理联想,与北方作家那种实证性的地理叙事关系不可同类并观。

历史感决定着作家创作的深邃,地理关系决定着小说创作的故事架构,人物关系和空间结构的开阔。这种历史的纵深感 and 地理的开阔性,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浙江文学的历史命运,浙江作家既难以形成像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河北等中原地区作家的那种深邃的历史感,更没法形成他们身居中原的那种四通八达的空间开阔性。这种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倘若说对浙江文学有什么影响,我以为最大的影响是在长篇小说上。时下的浙江文学,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等,皆处在全国的第一阵营,但是长篇小说确实是浙江文学的弱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屈指可数。

长篇小说究竟与地方历史的深度、空间开阔性有多大关系?浙江作家因为历史和地理的双重制约,是否就没有突破限制的可能?或者说“文学新浙派”有无再提的必要?我以为当然有必要。浙江虽然与中原的历史不同,但毕竟还是有自己的历史。“文学新浙派”再出发的关键,主要就是要处理好自然、历史、文化上的“我者”与“他者”的关系。所谓“我者”,就是浙江独

特的自然地理和社会历史状况,而“他者”,则是指构成文明互鉴与参照的北方中原。浙江的自然、地理、历史、生活、语言、人文,唯有在与“他者”的互鉴中才能建构起自己独特的诗意与美学气质。这些年,浙江作家扎根于自己的自然、地理、历史、生活创作小说的,其实并不多。早期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王旭烽的“茶人系列”当属此类;此外,萧耳写运河的长篇《鹊桥仙》、宁波作家浦子的“王庄三部曲”、衢州作家周新华的《黑白令》《喝彩师》、孙红旗的《国殇》《印舞》等,皆属此类。浙江其他作家的文学创作多以虚构和想象为主,很难说有多少浙江的地理、历史、社会、文化元素进入到小说中。

其实,浙江的小说家,形式感、小说技巧、语言能力、创新意识等,绝对不弱于全国其他任何地方,之所以在长篇小说领域没有形成声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作家们并没有能够很好地处理好地方小历史与国家大历史的关系。就像福克纳能够以“约克纳帕塔法世系”而构造出他的经典性那样,福克纳并不是因为他写出了他的故乡“约克纳帕塔法”,而是他能够在美国的大历史中写出他的故乡“约克纳帕塔法”与美国整体历史的关系,如《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写美国南北战争后南方的没落,《八月之光》《押沙龙,押沙龙!》写美国的种族主义悲剧。这样的文学史经验表明,浙江作家要想获得创作上成功,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以“大”观“小”,要以大的文明视野和大的国家整体观去观浙江,于大开大合之间写出别具南方气质同时兼具时代气息和国史气运的优秀作品。回过头来看,像鲁迅、茅盾等之所以能成就自己为“中国的”作家,不正是因为他们是以“大”观“小”,才写出《阿Q正传》《祝福》《故乡》和《春蚕》《林家铺子》等作品吗?

(作者系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

2023年5月,《文艺哲》杂志与《中华读书报》联袂评选的2022年度“中国人文学十大热点”,异军突起的“新南方写作”“新东北文学”在列,标志着地方性叙事,从地域性与世界性讨论文学业已是“现象级”的文学存在。“南”“北”写作虽然有着不同的写作地域、美学风格和文学意象,但两者遥相呼应,并成为当下令人瞩目的两股文学浪潮。这缘起文学批评的召唤,或许是一种回到批评现场,并不断创造文学活力的批评。

《江南》杂志倡导的“文学新浙派”,指的是浙派新一代作家群,是一大批从浙江文脉中生发出来的新力量。拙文《淡妆与浓抹——关于浙江青年文学的一种描述》(《文艺报》2020.12.1)就致敬过中国现代文学半壁江山的浙派。而新浙派年龄从“50后”到“90后”,覆盖了多个文学代际,其中既有文学大家,又有文坛中坚和年轻新秀:余华、麦家、王旭烽、艾伟、李杭育、钟求是、吴玄、哲贵、黄咏梅、东君、海飞、界愚、斯继东、张翎、陈河、王手、雷默、张忌、孔亚雷、黄立宇、杨怡芬、方格子、朱个、杨方、萧耳、池上、张玲玲、莉莉陈、王占黑、薛超伟、徐衍、草白、赵挺、林晓哲、赵雨等40余位在全国有影响的中青年作家,在当下的中国文学地图上成绩斐然,人数之众,质地精良,品相出色,早已形成醒目的文学新版图。虽还不能言及文学浙派在现代中国成为新文学的奠基人,但在当下的同期对比中,当可比肩而立。深度阐释这个堪称“现象级”的文学存在,成为文学批评不容忽视的使命。因为如此万千气象的江南才情和浙江气度的文学景观,本身就是一种文学生态,更是一种文脉传承中蓬勃生长的艺术新质。

## 在文脉上生发艺术新质

如果说“新南方写作”“新东北作家群”体现更多的是空间和文学表征的意义,是地缘政治与文学气质的互文关系;那么“文学新浙派”,则是时间意义上,文脉生发艺术新质的关系。新浙派如此繁茂的文学新树,是文学浙派文脉上开出的新花,繁花似锦,蔚然成林。

“新浙派”这一概念,在2023年《江南》第五期“中国地域文学新观察”专栏首次提出,并推出了黄咏梅、东君、界愚、斯继东、雷默、朱个等六位新浙江作家的小说。同期专栏还分别推出“新南方写作”“新北京作家”专辑。对于“文学新浙派”的第一次亮相,主编钟求是说“这不是简单一个新名词、新名号,浙江有较强创作实力、有发展潜质的中青年作家就有40来个活跃在当下的中国文坛。对这批作家,文坛对作家个体分别做过很多评价和阐述,但是把他们集合在一起进行观察,可能会发现不一样的文学景观”。

所言诚然。读完专栏,“新浙派”的文学表达坚

## 地缘气质与文脉新质

——以《江南》讨论“文学新浙派”为中心

□张燕玲



实而灵动,还确有来路和传统,他们既长于书写名士与乡绅文化,可居庙堂之高,更可处江湖之远,市井小巷、人间三昧如此精深辽远,笔下人物飞扬着吴越文化的魂魄,灵动丰满,静水流深。

东君《谁在冬夜谈论该谈的月亮》中人生失意者的愁肠、酒醉以及难以言说的人生况味始终弥漫整个故事,似鲁迅《野草》的苍茫夜空,如芒在背。醉了酒的人物,醒着的内心却还屹立着人的理想和尊严,作者用沉静而舒缓的叙述,缓缓铺陈人物命运的同时,更渲染着冬夜与人生的寒冷,以及老同学暖意的关切,人物包括老同学的父亲,三人两两对应潜伏着镜像般的关系。在小说呈现的残酷现实背后,包括标题对生活的诅咒,令我默念着《野草》的诗句:“生命的泥委弃在

通过地方认知和地方叙事,来塑造和展现近数十年来时代巨变和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历史记忆和社会体验,是一种立足地方、面向当下、面向未来的文学现象

色中大开大合,细密而悠远。《兜搭》中麻将搭档阿俊及其从未露面的主人公三姐的情感和命运,“在牌桌轻松气氛中,道尽人生百味”。“兜搭”既是男主阿俊在麻将桌“三缺一”的角色,也指阿俊与三姐貌似夫妻实则烤鸭店搭档,还是阿俊和三姐的人生写照,看似都是游戏,内里却讲游戏精神,有章可循,有情有义,无论游戏还是生活,直指世道人心,颇具象征意味。一如他此前以古琴、书法为意象的《禁指》《传灯》,都讲究戏中有戏,象外之象、名士之风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精神所持,内敛饱满,充满着象征的韵外之致。雷默《雕塑与男孩》,男孩小米以雕塑方式在失孤父母心中复活的故事,表现人心的救赎与人性的微光。雷默继续着在具体现实中挖掘境遇对人性的损伤与世态之歧,一如他的《信》《大樟树下烹鲤鱼》既摹写人情世态之歧,更有哀感静流。还有朱个《设而不求》,两个初中女生的情谊与命运关联,正是“如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就如她的成名作《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还有显示其内敛、均衡审美个性的《火星一号》,朱个的写作总是在变量中生发新境,颇有气象。

新近还读到新浙派“90后”作家薛超伟的小说集《隐语》,感悟着作者独特地在隐中语,为何隐?语什么?如何语?我尤其喜欢其中的短篇《化鹤》,13岁病童演山隐在寺庙养病,他以伤心的眼睛静静打量周遭的大千世界,文本散发出难以言说的伤感。有论者把《隐语》和“社恐”的时代症候关联在一起,我读却心生欢喜,以为并不止于“社恐”,而是多了清静自省的意味。我还想到灵隐寺,想到浙派隐士的文人传统。《化鹤》文字清静,清隽幽雅、舒缓自在之叙述颇得周作人平和冲淡之味,而其远离尘世、曲笔和禅意,乃至古拙的诗意,又有些许废名、林斤澜,甚至东君的气质,弥漫着吴越文化和超脱脱俗之气。而文本一抹挥之不去的忧伤,虽不明写,却又无时不在,无时不有。小说因情绪缠绕而意蕴丰富,余音绵长。

新浙派体现了新一代作家挖掘传统小说文脉,生发叙述艺术新质的文学自觉。也就是说,新浙派是有文脉传承的,是在文学浙派上开出的新花,在传统文脉中生发叙述艺术新质。正如艾伟所言:“新浙派”的提出既是对浙江现代文学作家的致敬和精神传承,也是对浙江这块文学土地的再一次确认。

## 在异乡重新发现故乡

地方性叙事当然是以作家个性为前提的,作家的地方性叙事源于其地缘性政治和社会生活,一如鲁迅远离故乡,才给人类贡献一个世界性的绍兴;还有生活在北京的沈从文对家乡湘西的重新发现,又比如居住在北京的林白,其新长篇《北流》

正是对故乡的重新发现,她笔下对北流小镇鲜活蓬勃的书写为新南方写作提供了美学新质。

新浙派专辑头条是黄咏梅的《这个平凡的世界》,正是身在居住地杭州的作者,对故乡梧州的再次重新发现。也可以说,是浙派文脉重新照亮黄咏梅原有的生活,成就了关于梧州和广州的系列世情小说,包括她获鲁迅文学奖的《父亲的后视镜》,小说的风物及其生活,就是梧州的山河烟火。《这个平凡的世界》成功塑造了新一代进城农民赵似锦这个人物形象。一尊马拉松奖杯给一个卑微寡淡的普通男子赵似锦找到了生活意义。为了进城,郊区青年赵似锦经人介绍娶了某单位领导的残疾女儿,当上门女婿,还有了工作,外人看了的确有似锦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官员岳父早逝,被打回平凡世界的赵似锦,依旧恪守诺言细心照料妻子和家庭,荒凉的内心与不懈的马拉松成为了他并不似锦的似锦人生。他就这样,常常从梧城(梧州)长跑到他的家乡长平区西圩街道(过去的梧州西郊梧县龙圩镇),以缅怀自己逝去的青春与初恋。而当真的偶遇他曾抛弃的初恋刘水仙,并得知家乡已经纳入自己的城市,而后者已是成功企业家并过着幸福生活时,尤其他还无意间看到根据路遥原著改变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与孙少平命运互为镜像成为了他的苦涩的内心生活。他不满孙少平被矿难毁容,“世事无常,人生难料,这就是平凡的世界”。他时时感悟自己并不似锦的无常的命运,与孙少平精神相遇后的赵似锦不再安之若素,他变得更寡言少语,而多了回望与自省。夜深人静时,他的生活叹息时常会伴着动物园东北虎低沉的哼哼出现,去势的老虎只是平常的稀松动物而已,一如赵似锦,一如平凡世界的芸芸众生。赵似锦释然了,属于他的人生根本停不下来,他以此找到自己生的意义,并找到了自我。从孙少平到赵似锦,这是改革开放到农村城镇化进程中一代农村青年的人生缩影,也是当代文学人物画廊的新典型。黄咏梅赋予赵似锦一种历史的回声,那份对每一个人物和细节的了然于胸与贴心贴肺,既引人入胜,又精雕细密,充满智性、隐喻和张力。而作者在平凡世界一点一点透出时代和历史足音的艺术自觉,再次丰富了黄咏梅“微观史学”的写作风格。

可见,通过地方认知和地方叙事,来塑造和展现近数十年来时代巨变和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历史记忆和社会体验,是一种立足地方、面向当下、面向未来的文学现象。同时,地方性叙事的讨论,令我们重新理解人与地域的关系,重新讨论地缘与文学气质、文脉与艺术新质、异乡与故乡的融通与创作之必然,也许可以为当下和未来的中国文学创造更多新的可能性,促进了中国文学格局的新发展。

(作者系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